

中华中篇小说百年精华

下



百年
典藏

BAI

NIAN

DIAN

CA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zhonghuazhongpianxiaoshuobainianjinghua

中华中篇小说百年精华

百年
典藏



下

目 录

陆文夫

美食家 2

张贤亮

绿化树 88

阿 城

棋王 257

池 莉

烦恼人生 297

方 方

风景 346

刘震云

一地鸡毛 417

余 华

活着 469

叶广芩

梦也何曾到谢桥 570

陆文夫

陆文夫(1928—),江苏泰兴人。一九四九年毕业于苏北盐城华中大学。后参加解放军,历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,《苏州日报》记者,江苏省文联专业作家,苏州市创作室专业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。

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荣誉》、《二遇周泰》、《小巷深处》等。短篇小说《小贩世家》、《围墙》分别获全国第三、五届优秀短篇小说奖,《美食家》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《美食家》中的主人公朱自治美食生涯的历史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:人性的堕落——人性的复归——人性的升华。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朱自治,是一个地道的寄生虫,行尸走肉,人形生物,满脑子只是一个吃。他在吃中挥霍人生、逃避人生。他是房产经营者,却不知自己的产业在何处;腰缠万贯、挥金如土,却孤独一人。对朱自治解放前生活的描写,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。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和困难时期,朱自治的肚皮瘪了,美食生涯虽然中断,但他却在人生的第二阶段对人对事对生活有了真切的感受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朱自治的美食生涯进入第三阶段,吃从人生的基本需求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享受,一种艺术创造。《美食家》是以第一人称“我”来叙述的。作家用虚实相生的手法,使“我”和朱自治这两个人物在交互作用中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性格。

美 食 家

一 吃 喝 小 引

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，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！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，不妙了：一个十分好吃的人。

好吃还能成家！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，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；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，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。我藐视他，憎恨他，反对他，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，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！

首先得声明，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；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，那末，我呱呱坠地之时，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，反不得的。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，生活节俭，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。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“反好吃”的教育，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：“好吃鬼，没有出息！”好吃成鬼，而且是没有出息的。孩子羞孩子的时候，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：“不要脸，馋痨坏；馋痨坏，不要脸！”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；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。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“反好吃”的教育，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。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，如今成“家”的朱自治以后，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。

朱自治是个资本家，地地道道的资本家，决不是错划的。有

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,他们有文化,懂技术,懂得经营管理。这话我也同意。可这朱自治却是个例外,他是房屋资本家,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。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,只消说三个字:“收房钱!”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,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。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,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。朱自治对此却是一窍不通,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,坐落在哪里,都是稀里糊涂的。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,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,家住在上海,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。抗日战争之初,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,全家有一幸免,那就是朱自治——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。朱自治因好吃而幸存一命,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。

我认识朱自治的时候,他已经快到三十岁。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,不对,朱自治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。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,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,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,倒是不敢多吃的。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,这话却有点道理。尽管朱自治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,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。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,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;买来以后便穿上身,脱下来的脏衣服却“忘记”在澡堂里。听说他也曾结过婚,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,也没有女人。只有一次,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,后来才知道,那女人是雇不到车,请求顺带的,朱自治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。

朱自治在上海的家没有了,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。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,西式的。有纱门、纱窗和地毯,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。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,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。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,

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；门堂、厨房、马达间、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。

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治的姑妈是表姐妹，所以在抗战后期，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，便搬进朱自治的住宅，住在前面的平房里。不出房钱，尽两个义务：一是兼作朱自治的守门人，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治料理点家务。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，朱自治早出晚归，没家没务，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。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，要帮他拆洗被褥，扫扫灰尘，打开窗户。他不仅不欢迎，反而觉得不胜其烦，多此一举。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，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，靠上枕头便打呼噜。

朱自治起得很早，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，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，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。眼睛一睁，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：“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！”这句话需要做一点讲解，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，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，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。

那时候，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，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。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，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，食谱里都有，算不了稀奇，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。吃还有什么吃法吗？有的。同样的一碗面，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，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。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：“喂！（那时不叫同志）来一碗××面。”跑堂的稍许一顿，跟着便大声叫喊：“来哉，××面一碗。”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，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的——硬面，烂面，宽汤，紧汤，拌面；重青（多放蒜叶），免青（不要放蒜叶），重油（多放点油），清淡点（少放油），重面轻浇（面多些，浇头少点），重浇轻面（浇头多，面少点），过桥——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，要放在另外

的一只盘子里,吃的时候用筷子撩过来,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……如果是朱自治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,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:“来哉,清炒虾仁一碗,要宽汤、重青,重浇要过桥,硬点!”

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,朱自治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;最重要的是要吃“头汤面”。千碗面,一锅汤。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,那面汤就糊了,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、滑溜,而且有一股面汤气。朱自治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,他会整天精神不振,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。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,必须擦黑起身,匆匆盥洗,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。吃的艺术和其它的艺术相同,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。

朱自治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,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。朱自治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,头这么一歪,脚这么一踩,叮当一阵铃响,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。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,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。

苏州的茶馆到处有,那朱自治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?有考究。那片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,摆着红木桌、大藤椅,自成一个新天地。那里的水是天落水,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;煮水用瓦罐,燃料用松枝,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。吃喝吃喝,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凡是称得上美食家的人,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的。

朱自治登上茶楼之后,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。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,决不能单独行动,最少不能少于四个,最多不得超过八人,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。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冷盆,接下来是热炒,热炒之后是甜食,甜食的后面是大菜,大菜的后面是点心,最后以一盆大汤作总结。这台完整的戏剧

一个人不能看，只看一幕又不能领略其中的含意。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。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，评论得失。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。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，为了慎重起见，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？是到新聚丰、义昌福，还是到松鹤楼。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，他们也结伴远行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，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，浩浩荡荡，马蹄声碎，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，枫桥镇上吃大面，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……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详细，生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，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。

二 与我有涉

如果朱自治仅仅自我吃喝而与我无关的话，我也不会那么强烈地厌恶他。他当他的美食家，我当我的穷学生，本来是能够平安相处的。可是我在前面的一节中只说到朱自治吃早点，吃中饭，他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！

朱自治吃罢中饭以后，便进澡堂去了。他进澡堂并不完全是为了洗澡，主要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消化那一顿丰盛的筵席。俗话说饿了打瞌睡，吃饱跑勿动。朱自治饱食一顿之后双脚沉重，头脑昏迷，沉浸在一种满足、舒畅而又懒洋洋的仙境境界里。他摇摇晃晃地坐上阿二的黄包车，一阵风似的拉到澡堂里，好像是到医院里挂急诊似的。

朱自治进澡堂只有举手之劳，即伸出手来撩开门帘。门帘一掀，那坐账台的便高声大喊：“朱经理来哉！”天晓得，朱自治哪一天当过经理的，对资本家应该喊一声老板才对。不过，老板这种尊称那时已经不时髦了。一是缺少点洋味，二是老板有大有

小,开片夫妻老婆店也能叫作老板的。经理就不同了,洋行经理,公司经理,买卖大,手面广,给起小账来决不是三块两块的,五十元的关金券用不着找零头!所以那跑堂的一听到朱经理来哉,立刻有两个人应声而出,一边一个,几乎是把个朱自治抬到头等房间里。这头等房间也和现在的高级招待所有点相似,两张铺位,一个搪瓷澡盆,有洗脸池,有莲蓬头。只是整个的面积较小,也没有空调设备。不碍,冬天有蒸气,夏天有一只华生老牌的大吊扇,四块木板在头顶上旋个不歇。

朱自治向房间里一坐,就像重病号到了病房里,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动手。跑堂的来献茶,擦背的来放水,甚至连脱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。朱自治也不愿费力,痴痴呆呆地集中力量来对付那只胃,他觉得吃是一种享受,可那消化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,必须潜心地体会,不能被外界的事物来分散注意力。集中精力最好的方法是泡在温水里,这时候四大皆空,万念俱寂,只觉得那胃在轻轻地蠕动,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甜美,这和品尝美食有异曲同工之妙,但是二者不能相互代替。他就这么四肢不动,两眼半闭地先在澡盆里泡上半个钟头。泡得迷迷糊糊、昏昏欲睡的时候,那擦背的背着一块大木板进来了。他把朱自治从澡盆里拉出来,把木板向澡盆上一盖,叫朱自治躺上“手术台”,开始了他那擦背的作业。读者诸君切不可把擦背二字作狭义的理解,好像擦背就是替人擦洗身上的污垢。不对,朱自治天天一把澡,有什么可擦的?这擦背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按摩术,是被动式的运动。饭后百步走被认为是长寿之道,但是奉行此道者需要自己迈开双腿。擦背则不同,只消四肢松弛地躺在“手术台”上,任人上摩下擦,伸拳屈腿,左转右侧,放倒扶起,同样收到运动的功效,却用不着自己花力气。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精通消化术,如果来个食而不化,那非但不能连续工作,而

且也十分危险！

朱自治的此种运动时间也不太长，大体上不超过半个钟头。然后便在卧榻上躺下，开始那一整套的繁文缛节，什么捏脚、拿筋、敲膀、捶腿。这捶腿是最后的一个节目，很可能和催眠术有点关系，朱自治在轻轻地拍打中，在那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中心旷神怡，渐渐入睡。这一觉起码三个钟头，让那胃中的食物消化干净，为下一顿腾出地位。

当朱自治快要醒来时，我也从学校里下学归来。书包一放，妈妈便来关照：

“今天还在元大昌，快去！”

妈妈的话只有我懂，那朱自治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！

朱自治吃晚饭也是别具一格，也和写小说一样，下一篇决不能雷同于上一篇。所以他既不上面馆，也不上菜馆，而是上酒店。中午的一顿饭他们是以品味为主，用他们的术语来讲叫“吃点味道”。所以在吃的时候最多只喝几杯花雕，白酒点滴不沾，他们认为喝了白酒之后嘴辣舌麻，味觉迟钝，就品不出那滋味之中千分之几的差别！晚上可得开怀畅饮了，一醉之后可以呼呼大睡，免得饱尝那失眠的苦味，因此必须上酒店。

苏州的酒店卖酒不卖菜，最多备有几碟豆腐干，兰花豆，辣白菜之类。孔乙己能有这些便行了，君子在酒不在菜嘛。美食家则不然，因为他们比君子有钱，酒要考究，菜也是马虎不得的。既不能马虎，又不能雷同，于是他们便转向苏州食品中的另一个体系——小吃。提到苏州的小吃我又不愿多写了，除掉如前所述的原因外，还因为它会勾起我一段痛苦的回忆，我被一个我所厌恶的人随意差遣！

苏州的小吃不是由那一片店经营的，它散布在大街小巷，桥堍路口。有的是店，有的是摊，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。如

果要以各种风味小吃来下酒的话,那就没有一个跑堂的能对付得了,必须有个跑街的到四下里去收集。也许是我的腿长吧,朱自治便来和我妈商议:

“你家高小庭蛮机灵,阿好相帮我做点事体,我也勿会亏待伊。”

妈妈当然答应啰,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不给钱,又没有什么家务可料理,心里老是过意不去,巴不得能为朱自治做点事,以免良心受责备。可怜的妈妈不知道剥削二字,只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法规。她教育儿子不能好吃,却对朱自治的好吃不加反对,她认为那是一种“吃福”,好吃与吃福是两回事体。可我却把它当作一回事,怎么也不愿意去替朱自治当跑街的。堂堂的一个高中生怎么能去给一个好吃鬼当小厮呢!

妈妈又哭了,父亲谢世后家境贫困,是靠我的大哥当远洋水手挣点钱:“去吧小庭,我们头顶人家的天,脚踏人家的地,住了人家的房子不出房租,又不交水电费,算起来相当于全家的伙食费。只要朱经理说个不字,你就念不成书,我们一家就会住在露天里。只怪你爸爸走得早啊,我求求你……”

我只好忍辱负重了,每天提着个竹篮去等候在酒店的门口。等到华灯初上,霓虹灯亮满街头的时候,朱自治和他的吃友们坐着黄包车来了。一长串油光锃亮的黄包车,当当地响着铜铃,哇哇地撒着喇叭,像游龙似的从人群中夺路而来,在酒店门口徐徐地停下。他们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,浑身散发着香皂味,满面红光,春风得意。朱自治的黄包车总是走在前面,车夫阿二也显得特别健壮而神气。阿二替朱自治掀掉膝盖上的毡毯,朱自治一跃落地,轻松矫捷。在酒店门口迎接他们的不是老板,也不是跑堂的,而是两排衣衫褴褛,满脸污垢,由叫花子组成的仪仗队。乞丐们双手向前平举,嘴中喊着老爷,枯树枝似的手臂在他的左

右颤抖。朱自治似乎早有准备，手一扬，一张小票面的钞票飞向叫花子头：“去去。”

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，我这个手提竹篮，倚门而立，饥肠辘辘的特殊叫花子便到了朱自治的面前。这个叫花子所以特殊，是因为他知道一点地理历史，自由平等，还读过三民主义；他反对好吃，还懂得人的尊严。当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而把我烘托出来的时候，我满腔怒火，汗颜满面，恨不得要把手中的竹篮向朱自治砸过去！可是我得忍气吞声地从朱自治的手中接过钞票，按照他的吩咐到陆稿荐去买酱肉，到马咏斋去买野味，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，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，到玄妙观里去买油氽臭豆腐干，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风味小吃寻觅……

我提着竹篮穿街走巷，苏州的夜景在我的面前交替明灭。这一边是高楼美酒，二簧西皮，那霓虹灯把铺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斓；那一边是街灯昏暗，巷子里像死一般的沉寂，老妇人在垃圾箱旁边捡菜皮。这里是杯盘交错，名菜陆陈，猜拳行令；那里却有许多人像影子似的排在米店门口，背上用粉笔编着号码，在等待明天早晨供应配给米。这里是某府喜事，包下了整个的松鹤楼，马车、三轮车、黄包车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。新娘子轻纱披肩，长裙曳地，出入者西装革履，珠光宝气；可那玄妙观的廊沿下却有一大堆人蜷缩在麻袋片里，内中有的人也许就看不到明天……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这句众所周知的诗句常在我的头脑里徘徊。

朱自治倒是不肯亏待我，常常把买剩的零钱塞在我的口袋里：“拿去！”那神情和给叫花子是差不多的。

我睁眼、僵立。感到莫大的侮辱。

“拿去吧，是给你奶奶买肉吃的。”

侮蔑被辛酸融化了。我是有个老祖母,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,那时已经七十六岁,满嘴没牙,半身不遂,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。可是她的胃口很好,天天闹着要吃肉,特别是要吃陆稿荐的乳腐酱方,那肉入口就化,香甜不腻。她弄不清楚物价与货币的情况,在她的头脑中一切都是以铜板和银元计算的。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来几千块钱(能买一百多斤米),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个铜板给她称一斤肉回来呢?三百个铜板才合一块钱!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的妈妈,骂她忤逆不孝,克扣老人,而且牵牵连连地诉说着陈年八代的婆媳关系,一面骂一面流眼泪。妈妈怎么解释也没用,只好一面在配给米里捡石子,一面把眼泪洒在淘米箩里。我在这两条泪河之间把心都挤碎!

当我用朱自治的零钱买回几块肉来,端到奶奶的床前时,她一面吃,一面哭,一面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我的头:“好孙子,还是你孝顺,奶奶没有白带你……”

我一听这话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流,我想大哭,大喊,想问苍天!可是我拚命地哽住喉咙,俯伏在奶奶的床头,把头埋在棉被里。既然在侮蔑中把钱接过来了,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得到一点安慰!

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啊!这句老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,而且大言不惭地把苏州放在杭州的前面。据说此种名次的排列也有考究,因为杭州是在南宋偏安以后才“春风熏得游人醉,错把杭州作汴州”。而苏州在唐代就已经是“十万夫家供课税,五千子弟守封疆”了。到了明代更是“翠袖三千楼上下,黄金十万水东西”。近百年间上海崛起,在十里洋场上逐鹿的有识之士都在苏州拥有宅第,购置产业,取其进可以攻,退可以守。苏州不是政治经济的中心,没有那么多的官场倾轧,经营的风险;又不是兵家的必争之地,吴越以后的两千三百多年间,没有哪一次重大

的战争是在苏州发生的；有的是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，风景优美。历代的地主官僚，富商大贾，放下屠刀的佛，怀才不遇的文人雅士，人老珠黄的一代名妓等等，都欢喜到苏州来安度晚年。这么多有钱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乐业，吃喝和玩乐是不可缺少的，这就使苏州的园林可以甲天下，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！风景不能当饭，天天看了也乏味，那吃却是一日三顿不可或少的。苏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，恐怕主要是因为它的美食超过了杭州。这也许是苏州人的骄傲吧，可我那时简直觉得这是一种罪恶，是人间最最不平的表现！我不知道地狱里可有“天堂”，可我知道“天堂”里确有地狱，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地狱的边缘上徘徊。说老实话，当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，我没有读过《资本论》，也没有读过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多半是由朱自洽他们促成的；他们使我觉得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主义都没有用，只有共产才能解决问题！如果共掉了朱自洽的房产，看他还神气不神气！

我偷偷地唱着一支从北平传来的歌：

山那边呀好地方，
穷人富人都一样，
你要吃饭得做工呀，
没人为你作牛羊。

.....

这支歌的曲调很简单，唱起来也用不着尖起嗓门儿费死力，可它却使我从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中找到了出路，出路就在山那边！

我决定到解放区去了，那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。我不知道解放区的形势，总以为国民党还很强大，还有美国的原子弹

什么的。无产阶级要夺取全国胜利,恐怕还要经过几年、几十年的浴血奋斗!我读过《铁流》与《毁灭》,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,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洗礼。所以当时的心情很悲壮,准备去战死沙场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”当时的心情很有点像荆轲辞别高渐离。

我的高渐离便是苏州,是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叫我去战斗!临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,站在虎伏阁上把这美丽的城市再看一遍:再见吧,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尽你身上的污垢!傍晚,我照样去替朱自冶买小吃,照样买了一块乳腐酱方送到奶奶的床前:吃吧,奶奶,孙子从屈辱中接过钱来为你买肉,这恐怕是最后的一回!我的判断没有错,当奶奶发觉最孝顺的孙子失踪之后,她哭喊了三天便与世永别。

年轻时的记忆多么深刻啊!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挂牌、游街、屈辱、受罪如今已经淡忘了,仿佛那是一场不屑一顾的游戏。可是三十多年前离家别井,暗中告别亲人,向着黑暗猛冲的情景却点滴不漏地保存在记忆里。也许我是欢喜记着光荣而忘掉屈辱吧,可又为什么不把三四十年前的屈辱也忘记?每当我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受伤的战士从血泊中爬起来,举起枪,高喊着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扑过去的时候,我的心便会向下一沉,两眼含着泪水。虽然这种镜头看得太多了也觉得老一套,可是这种话我不许孩子们说,孩子们一说我就要骂:“小赤佬,你懂什么东西!”

三 快乐的误会

没想到我进入解放区已经太晚了,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已经消散,枪炮声已经沉寂。解放区的军民沉浸在欢乐的高潮中,准

备打过长江去！我们这些从蒋管区去的学生被半路截留，被编入干部队伍随军渡江去接管城市。我从苏州来，当然应该回到苏州去，因为我熟悉那里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种好听而又十分难懂的语言，带个路也方便。至于回到苏州去干什么，谁也没有考虑，如果那时有人提出什么前途、专业、工资、房子等等，我们这一伙“小资产”便会肯定他是国民党派来的！革命就是革命，干什么都可以，随便。我们的组织部长却不肯随便，一定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志趣来分配，因此就出现了十分快乐的场面：

组织部长把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兵招集到一个祠堂里。祠堂的正中摆着方桌，桌上放着档案和纸笔，二十多人分坐在两边。

组织部长是个大知识分子，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机械系。他对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十分熟悉：“现在要给大家分配工作了，组织上尽量照顾各人的特长和志愿，希望你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好好地考虑，分定之后就不许犯自由主义。”

当时的气氛本来很严肃，却被我的老同学，浑号叫丁大头的人弄得豁了边。丁大头的头其实也不大，可是他的知识很广博，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哲学他样样都懂一点。因为他的脑子里包容的东西太多，所以看起来他的头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点。他第一个被部长叫起来：

“你想干什么呢？”

“随便。”丁大头回答得很爽气。

部长翻了翻眼睛：“随便是个什么东西？说得具体点。”

“具体点……那也随便。”

人们哄堂大笑了：“他什么都懂，可以随便！”

部长也笑了，翻翻档案：“什么都懂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……我问你，你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？”

“看书。”